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海外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发展

刁莉^{1,2}, 田媛³

(1. 武汉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2.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摘要: 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增加, 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移民也越来越多。文章分析了近20年的20个“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移民的数据, 考查了华人移民的经济活动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 结果显示: “一带一路”国家的华人移民投资活动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东道国非居民的专利申请、专有技术的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对“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华人移民通过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20个“一带一路”国家中, 华人移民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发挥的作用更大。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华人移民; 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 F11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432 (2023) 24-0001-07

DOI: 10.13939/j.cnki.zgsc.2023.24.001

1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工程承包有了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 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双边贸易额显著增长趋势。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9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的56个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150.4亿美元, 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3.6%。伴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资企业数量的增加、沿线各国移民政策程序的简化以及相关投资优惠政策的出台, 我国向东道国的国际移民输出也呈现出增长趋势, 截至2019年年末,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人华侨数量达到了4000多万(贾益民等, 2019)。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并购和技术投资的规模不断增长,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人移民迎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代, 根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20)》, 2019年中国内地移民的前20个目的国中有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新加坡(38.01万人)、孟加拉国(16.49万人)、印度(10.83)、泰国(7.76万人)、印度尼西亚(7.55万人)、俄罗斯(5.62万人)、菲律宾(3.7万人)。

关于“一带一路”国家的范围, 有广义上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家, 也有中观意义上的“一带一路”倡议国家, 具体的范围划分参见第三部分的样本选择。根据官方数据: 截至2021年6月23日, 中国已经同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①。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文章的研究范围主要为中观意义上的“一带一

路”国家, 主要包括中亚五国、西亚、南亚和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三国。这个是基于中观意义上的“一带一路”范围。当“一带一路”刚被提出之时胡鞍钢(2014)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层段: 中亚经济带(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环中亚经济带(涵盖中亚、俄罗斯、南亚和西亚); 亚欧经济带(包括环中亚地区、欧洲和北非)。刘政(2019)在环中亚经济带的基础上划分了中观意义上的20个“一带一路”国家, 包括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南亚四国(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西亚八国(伊朗、以色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考虑到这20个中观意义上的国家与我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 且较早参与到“一带一路”合作共建中, 因此文章采用这2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目前大部分有关海外华人移民的研究文献, 聚焦移民对于我国对外投资以及两国的双边贸易的影响, 把我国作为研究主体, 缺乏对移民目的国的考察。在对外投资方面, 有文献研究了海外华人网络通过降低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差异, 间接促进中国对外投资, 且这种正向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在文化差异大和制度质量低的东道国更明显(袁海东、朱敏, 2017)。还有文献在双边贸易方面进行了研究: 我国

^①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 - 中国一带一路网(yidaiyilu.gov.cn)。

的移民网络主要通过直接通道效应促进对外贸易(王云飞、杨希燕, 2015), 对双边进、出口额有正向影响, 且与华人移民在东道国所占人口比例无关(刘政等, 2019)。海外华人移民群体在中国的国际贸易发展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地域性的差异, 张晓毅(2019)认为中国海外移民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集约边际具有显著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促进作用, 但在扩展边际方面具有负向作用; 赵永亮(2012)认为华人移民网络在拉丁美洲、非洲这类新兴经济体中成本克服效应更为显著, 而在亚洲及北美地区移民消费偏好效应更突出等。近年来, 也有很多文献研究了关于移民和东道国的发展问题。移民不仅通过自主研发为自己的生产领域做出了贡献, 还通过外部性提高了东道国发明者的生产率, 在其他领域做出了贡献(Ufuk Akcigit, 2017)。那么, 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构有没有影响? 这种影响有没有影响到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部分文献中仅提到了人力资本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Claudio Fassio, 2019), 更多的学者认为华人移民是提升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以及两国双边贸易的关键因素, 而忽视了华人移民对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结构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此, 文章选取胡鞍钢(2014)和刘政(2019)划分的中义上的 20 个“一带一路”国家作为研究对象, 在对跨国移民、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三者关系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 利用 CSMAR 国泰安数据库、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中经网等数据库的数据, 以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 研究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

相较于现有文献, 文章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探究华人移民与这 20 个移民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构、经济增长的关系, 剖析移民影响东道国经济的作用路径, 研究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针对东道国异质性, 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 与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国家中, 华人移民有什么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其余部分结构为: 第二部分对中国与中观意义上的“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现状进行梳理; 第三部分为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 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对策建议。

2 中国与中观意义上的“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现状

2.1 中观意义层面“一带一路”国家华人华侨概况

随着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的不断增多和两国贸易往来的不断密切, 在俄罗斯从商和工作的华人越来越多, 2018 年年末, 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人达到了 99.8

万人, 尽管大多数华人从事商业贸易, 并未在俄罗斯定居, 但庞大的华人网络有助于消除两国之间无形的贸易障碍, 促进两国的经贸合作。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华人主要是中资企业的员工和留学生, 目前这两个国家的华人分别为 8000 人和 5000 人。中国向中亚国家的移民主要集中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截至 2019 年年底, 这三个国家的华人华侨数量分别为 1 万人和 8000 人, 这些华人主要开展油气、工业、农业、能源类、交通、化工、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合作。在南亚: 中国向南亚的移民主要流向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中国每年有 17.87 万人移民孟加拉国, 其原因在于中国与孟加拉国的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孟加拉国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重要工程承包市场, 在孟华人主要从事纺织、铁路、通信和城市建设等项目。在西亚: 西亚的华人华侨主要集中在沙特阿拉伯, 目前沙特阿拉伯的华人华侨约有 3 万, 以从事小商业、旅店等服务业为主, 少数人在沙特政府部门、商工会、学校、企业等任职。

2.2 中国对中观意义层面“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现状

当前, 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行业主要分布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电力和生产供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其中, 制造业是最大产业, 2018 年投资流量达 58.8 亿美元, 增长速度最快, 同比增长 42.6%, 占比接近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总投资的 1/3, 达 32.9%。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批发和零售业的投资额不断增大, 2018 年投资额达 37.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37.7%, 占比 30.3%。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国加快了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步伐, 积极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 我国的投资数量和投资质量均有所提高。

从图 1 可以看出, 2003—2019 年我国对南亚的投资一直呈现总体增长, 局面波动增长的趋势, 投资额在 2014 年和 2019 年分别达到局部区域的峰值 1.38 亿美元和 1.5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93% 和 172%。2003—2016 年我国对西亚八国的对外投资基本维持增长态势, 在 2017 年骤然减少, 但在之后的两年又恢复增长趋势。我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波动比较大, 2012 年我国对中亚地区投资额突破了 3.37 亿美元, 是当年对“一带一路”国家中投资量最大的地区, 但随后投资开始下降, 直到 2015 年下降到谷底后触底反弹, 此后的 2016 年、2017 年投资额增幅较大, 2017 年同比增长了 110%。2003—2015 年我国对欧洲

的投资流量也呈现出平缓的增长趋势, 在 2014 年稍有下降, 但在 2015 年又马上恢复增长, 总投资流量突破 3 亿美元, 但从 2016 年开始, 我国对欧洲的投资逐年下降, 在 2019 年变为负数, 说明此时已转化为欧洲对我国进行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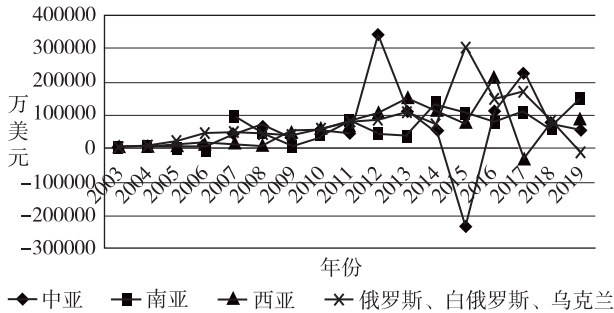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流量情况

数据来源: 2009、2015、2019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我国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经贸往来日益频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人华侨数量也逐年攀升,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也逐年增长。这种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否有华人移民的推动, 华人移民是否对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构具有改善作用, 或者说, 华人移民能否对东道国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产生影响, 从而进一步对经济总量产生影响, 这需要通过定量研究来加以分析说明, 于是文章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分析 20 个中义上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华人移民、人力资本结构和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3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3.1 样本选择

近年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文章在官方发布的信息与胡鞍钢 (2014)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内涵意义分析的基础上, 并借鉴了刘政 (2019)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人移民与对外贸易的研究中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分类, 将“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与地区划分为狭义、中义与广义三个层面。狭义包括中亚五国 (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中义是在狭义基础之上又包括南亚四国 (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西亚八国 (伊朗、以色列、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约旦、沙特阿拉伯) 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 广义是指现阶段与我

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所有国家。由于中义层面的“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因此选择这 20 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更具代表性。

表 1 样本国家

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	吉尔吉斯斯坦 (Kyrgyzstan)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	土库曼斯坦 (Turkmenistan)	阿富汗 (Afghanistan)
印度 (India)	巴基斯坦 (Pakistan)	孟加拉 (Bangladesh)
伊朗 (Iran)	以色列 (Israel)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亚美尼亚 (Armenia)	格鲁吉亚 (Georgia)	土耳其 (Turkey)
约旦 (Jordan)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俄罗斯 (Russia)	乌克兰 (Ukraine)	白俄罗斯 (Belarus)

3.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3.2.1 主要变量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水平用该国的人均 GDP 衡量,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中国海外移民 $mig_{i,t}$: 刘政等 (2019) 使用东道国的移民存量作为华人移民的指标来分析华人移民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基于移民数据的可获得性, 文章选取了 1995 年、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5 年中国对 20 个中义层面“一带一路”国家的移民数据, t 期数据分别对应 1995—2015 年每隔 5 年的数据。人力资本 $pat_{i,t}$: Douglas (2015) 使用专利引用作为欧洲移民到美国创造知识的代理变量,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 文章参考这篇研究将“非居民专利申请、专有技术”数作为移民影响知识积累成果的代理变量。

3.2.2 控制变量

“一带一路”国家人口增长率 $pop_{i,t}$: 胡鞍钢等 (2012) 将人口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并得到了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的结论; 贸易开放度 $open_{i,t}$: 陈继勇和陈大波 (2017) 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开放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并得到了贸易自由度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 政府消费 $gov_cost_{i,t}$: 陈建宝等 (2017) 基于 MS-VECM 模型研究了我国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证明了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存在着互相制约的稳定均

衡关系; 人均收入情况 $pincome_{i,t}$: 马进 (2018) 研究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的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 2。

表 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简称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gdp_{i,t}$	人均 GDP	东道国 i 在 t 期的人均 GDP	世界银行
$mig_{i,t}$	华人移民	中国在第 t 期 (年) 对东道国 i 的移民存量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pat_{i,t}$	人力资本	东道国 i 在 t 期 (年) 的非居民专利申请数	CSMAR
$pop_{i,t}$	人口增长率	东道国 i 在 t 期的人口增长率	中经网
$open_{i,t}$	贸易开放度	东道国 i 在 t 期 (年) 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	世界银行
$gov_cost_{i,t}$	政府消费	东道国 i 在 t 期 (年) 的政府消费	中经网
$pincome_{i,t}$	人均收入	东道国 i 在 t 期 (年) 的人均收入水平	CSMAR

3.3 模型设定

3.3.1 基本回归模型

基于增长模型, 引入移民影响知识积累成果的代理变量来扩展增长模型并建立文章的基础计量模型:

$$\ln gdp_{i,t} = \alpha + \beta_1 \ln mig_{i,t} + \beta_2 \ln pat_{i,t} + \beta_3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被解释变量 $gdp_{i,t}$ 表示“一带一路”国家 i 在 t 期的人均 GDP; $mig_{i,t}$ 表示中国在第 i 期 (年) 对“一带一路”国家 i 的移民存量; $pat_{i,t}$ 为“一带一路”国家 i 在 t 期 (年) 的非居民专利申请数; $Z_{i,t}$ 为控制变量, 代表其他可能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包括“一带一路”国家人口增长率、贸易开放度、政府消费以及人均收入情况; $\varepsilon_{i,t}$ 是随机扰动项。 α 代表常数项, β_1 表示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 β_2 表示中介变量 (人力资本) 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 β_3 表示控制变量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3.3.2 中介效应模型

为验证华人移民可以通过激励东道国的模仿性知识积累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 在此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探究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时, 若 X 通过影响变量 M 来影响 Y , 则称 M 为中介变量。

$$Y = \alpha X + \varepsilon \quad (2)$$

$$M = \beta X + \varepsilon \quad (3)$$

$$Y = c_1 X + c_2 M + \varepsilon \quad (4)$$

前文的分析表明华人移民通过推动东道国人力资本增长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 为验证该假设, 文章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 (2014) 的中介效应模型建立了如式 (5) 至式 (8) 所示的中介效应模型。

$$\ln gdp_{i,t} = \alpha_0 + a \ln mi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

$$\ln pat_{i,t} = \alpha_0 + b \ln mi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ln gdp_{i,t} = \alpha_0 + c_1 \ln pat_{i,t} + c_2 \ln mi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7)$$

将式 (6) 代入式 (7) 中可得:

$$\ln gdp_{i,t} = \alpha_0 + (bc_1 + c_2) \ln mig_{i,t} + \varepsilon_{i,t} \quad (8)$$

式 (5) 中, 以东道国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 华人移民为解释变量, 研究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总效应 a ; 式 (6) 中以东道国知识积累模仿和技术进步所代表的人力资本为被解释变量, 以华人移民为解释变量, 研究华人移民对人力资本的影响 b ; 式 (7) 在式 (5) 的基础上加入了中介变量人力资本结构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 c_1 表示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 c_2 表示华人移民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 式 (8) 是对式 (6) 和式 (7) 的整合, 其中 bc_1 表示移民对于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如果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则需证明式 (5) 中的系数 a 是显著的, 同时, 式 (6) 中的系数 b 和式 (7) 中的系数 c_1 、 c_2 也必须是显著的。若 b 和 c_1 乘积的符号与 c_2 的符号一致, 则证明华人移民既可以直接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 也可以通过影响东道国人力资本间接对经济产生影响。若式 (1) 中 a 显著, 但式 (5) 中系数 b 和式 (6) 中系数 c_1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 则需要进行 Bootstrap 检验, 检验结果显著则表明存在中介效应 (陈晓等, 2020)。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3 为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可看出变量之间没有很强的相关性。为检验稳健性做了 VIF 检验, 膨胀因子最大为 4.8, 平均值为 2.68, 远小于 10, 表示无严重共线性,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回归分析。

4.2 基本回归分析

首先对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总体效应进行检验, 通过 Hausman 检验发现不能拒绝“不存在个体固定效应”的原假设, 故选择“随机效应”进行检验, 并采用稳健的标准误进行估计, 为检验结果

的稳健性, 加入“混合回归”做对比参照。在表 4 的第 (1) 列和第 (2) 列中没有加入华人移民这个核心解释变量, 结果显示, 移民促进东道国模仿性知识积累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在表 4 的

第 (3) 列和第 (4) 列中加入华人移民的解释变量, 两个模型的实证结果都表明华人移民对“一带一路”区域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 3 相关性分析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lngdp	lnpincome	lnpat	lnmig	lnpop	lngov_cost	open
lngdp	1						
lnpincome	0.965***	1					
lnpat	0.372***	0.361***	1				
lnmig	0.106	0.128	0.512***	1			
lnpop	-0.0640	-0.0430	0.652***	0.549***	1		
lngov_cost	0.245*	0.191	0.295*	0.447**	0.154	1	
open	0.0460	0.0620	-0.344***	-0.252*	-0.574***	0.329**	1
平均值	7.5071	8.6669	5.6994	7.743661	10.0368	11.1313	45.3512
标准差	1.3016	0.9853	2.4126	2.2777	1.5395	3.0178	13.0606

表 4 总体回归结果

变量	POLS 模型	RE 模型	POLS 模型	RE 模型
lnpincome	1.274*** (17.40)	0.163*** (19.25)	1.329*** (11.73)	0.177*** (19.85)
lnpat	0.073* (1.80)	0.07** (2.39)	0.069* (1.81)	0.07** (2.19)
lngov_cost	0.044** (2.15)	0.004* (1.69)	0.035 (1.20)	-0.03* (1.85)
lnpop	-0.186*** (4.38)	-0.021*** (4.44)	-0.095* (1.78)	-0.07 (1.54)
open	-0.007*** (3.44)	-0.001*** (3.50)	-0.005 (1.00)	-0.001** (2.56)
lnmig			0.65** (2.38)	0.13* (1.83)
Constant	-2.184** (2.68)	0.755*** (7.46)	-2.423 (1.63)	0.625*** (5.37)
Observations	85	85	60	60

注: “***” “**”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

4.3 稳健性检验

由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各国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进行知识积累和创新活动的类型也不相同, 华人移民在促进东道国知识积累和促进经济增长上的影响也有差异。而在文章选取的 20 个中义层面“一带一路”国家中,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少数南亚国家相对来说经济发展程度较好, 而中亚、西亚与部分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则较为落后, 故在此以区域作为划分对不同国家进行分组检验。

由表 5 检验结果看, 不同地区华人移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从实证结果来看, 中亚国家非居民专利申请数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而移民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负, 出现这样的结果, 可能的原因有: ①1995—2015 年中亚国家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 例如 1992 年的斯拉夫人移民潮、1994 年和 1996 年的迁移高峰, 以及 2007 年俄罗斯实施“侨胞自愿迁居俄罗斯计划”后中亚国家中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和熟练技术人员移民俄罗斯, 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造成了数百万的劳务移民流向俄罗斯等国, 本地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中亚国家的经济造成冲击, 导致实证检验结果与预期产生偏差。②可能由于中亚国家存在腐败现象导致利润少报、不按实际上报的情况, 从而影响实际的经济增长。《腐败指数报告》(透明国际) 表明, 近几年在大约 175 个被考察的国家中中亚五国的腐败情况一直在倒数 1/3 的位置。刘俊霞 (2018) 关于中亚投资条约仲裁案件的实证研究表明, 截至 2017 年 9 月, 已完成仲裁程序的案件中涉及中亚五国腐败问题的约有 11 起, 占比达 57.9%。腐败程度高会增加投资的不确定性, 从而影响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并阻碍外国资本的流入, 这严重影响了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 从而可能导致实证结果与预期不符。

从表 5 中还可以看出, 华人移民的专利知识产权对南亚国家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经济发展有明显影响, 但经济增长不明显, 南亚国家人口众多且工业基础薄弱, 对劳动力的吸收有限, 无论是进行模仿性技术活动还是创新性技术活动, 对人力的需求都较少, 因此华人移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仅仅为小部分的推波助澜。而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回

归结果不显著,推测是由于自己有部分领域技术发展水平较高,华人移民对其模仿性活动和技术进步无法产生显著影响。而华人移民对于西亚各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由于西亚以石油产业和石油加工产业为主,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所以外来劳动力的流入对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

表 5 不同地区华人移民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变量	中亚	南亚	西亚	俄、白、乌
<i>lnpincome</i>	2.164*** (16.27)	1.169*** (16.95)	1.361*** (13.52)	1.523* (2.53)
<i>lnpat</i>	0.295*** (4.04)	-0.036* (2.46)	0.139** (2.54)	-0.394 (0.47)
<i>lnpop</i>	-2.158*** (6.94)	0.052 (0.38)	0.012 (0.21)	-3.423 (0.58)
<i>lnmig</i>	-0.379*** (6.00)	0.041* (2.09)	0.064** (2.20)	2.115 (1.63)
<i>Constant</i>	9.992*** (5.06)	-3.462** (2.56)	-4.564*** (6.01)	15.324 (0.44)

4.4 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参考国内外期刊中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采用 Bootstrap 检验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由表 6 可知,人力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值为 0.334,且偏差校正的置信区间未包含 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此外,解释变量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为 0.139,也是显著的。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华人移民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呈显著正效应,华人移民有效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结构在华人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这是由于华人移民的先进技术鼓励了东道国进行模仿性知识积累和创新活动,激励了东道国技术进步,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

表 6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estimate	SE	BC 95%置信区间	
			上限	下限
中介效应	0.334*** (3.88)	0.0881	0.1614	0.5068
直接效应	0.139** (2.43)	0.0589	0.0236	0.2547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 主要结论

文章运用 1995—2015 年每隔 5 年的统计数据,

实证检验了华人移民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以及通过影响东道国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间接影响,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华人移民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华人华侨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二,东道国非居民的模仿性知识积累、专有技术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东道国非居民专利申请数越多,表明通过移民带来的人力资本越多,即人力资本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第三,人力资本在华人移民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华人移民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起到重要作用,改善了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第四,“一带一路”国家中华人移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东道国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中亚和部分西亚国家,劳动力人口缺乏,且低端劳动力较多,人均 GDP 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华人移民通过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发挥的正向作用比俄罗斯等国家的作用更大。

5.2 对策建议

通过前文的分析以及对结论的思考,文章提出了以下四点对策建议,希望能更好地发挥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和独特优势,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

第一,发挥侨智侨商的桥梁作用,既要“走出去”,又要“引进来”。一方面,中国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持和帮助的力度,比如增加在道路、体育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提高这些国家对国内以及华人华侨的友好度。同时,利用侨商在住在国良好的人脉关系以及对当地政治法律、文化环境的较好把握,中国的本土企业可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先进和优质企业进行收购,通过收购不仅可以使国内的相关产业的短板得到补足,也有助于国内企业拓宽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发挥好华人华侨的桥梁作用,以侨引侨,以商招商,吸引更多优质的国外企业抓住机遇来华投资,开展多渠道和多层次的经济合作,推动国内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入的合作关系。

第二,充分利用侨智侨商等资源,推动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创新驱动发展。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侨界中,大部分华人是具有高学历和专业知识技能的高层次人才,相较于东道国的大部分劳动力,他们在国际视野、创新理念方面具有优

势,因此,要充分发挥华人华侨的作用,促进当地创新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技术和人才的输出,不仅促进当地的发展,也有助于我国和沿线国家更好的分工合作。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些在我国已经发展成熟的技术在“一带一路”国家还比较新颖,因此可以通过华人华侨促进当地模仿性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同时,我国可以生产对技术要求更高的产品,为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机会。

第三,发挥华人华侨的纽带作用,推动形成国内外合作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这要求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更大范围和更宽领域参加全球化的国际产业分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规模、不同技术水平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可以加入价值链,这既能帮助它们扫除各种障碍,也提高了价值链的完整性、协调性和包容性,构建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畅通。最重要的是,促进华人华侨在两国劳动力市场的跨区域流动,通过交换彼此所需要的资金、人力资本和产品,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

第四,加强华人华侨的信息媒介功能,降低由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风险。我国目前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面临低收益、高风险、中国政府出资比重过高、经济贸易政治化以及国内产业结构失衡等风险的威胁。因此,可以通过引入国际金融机构等第三方来参与投融资,从而形成多边合作参与机制,推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消耗,转移中国优质富余产能的同时要保留国内优势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在各国的华人华侨来了解东道国的基本情况,增加对当地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了解,选择经济发展程度更低、制造业初具规模、政治生态良好的国家开展产能合作,以此来防范风险的发生,提升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合作水平。

参考文献:

- [1] 贾益民,张禹东,庄国土,等.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9)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 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2):1-11.
- [3] 刘政,任芳好,蔡宏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人移民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J]. 经济纵横,2019(4):86-94.

[4] 袁海东,朱敏. 海外华人网络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视角 [J].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7(5):79-89.

[5] 王云飞,杨希燕. 社会网络促进我国对外贸易了吗?——基于移民网络视角的检验 [J]. 世界经济研究,2015(10):101-109,129.

[6] 刘政,任芳好,蔡宏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人移民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J]. 经济纵横,2019(4):86-94.

[7] 张晓毅,刘文. 中国海外移民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 [J]. 山东社会科学,2019(6):100-105.

[8] 赵永亮. 移民网络与贸易创造效应 [J]. 世界经济研究,2012(5):57-64,86,88-89.

[9] AKCIGIT U, GRIGSBY J, NICHOLAS T. Immigration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ingenu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5):327-331.

[10] FASSIO C, MONTOBBIO F, VENTURINI A. Skilled mig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European industries [J]. Research policy, 2019, 48(3).

[11] 刘政,任芳好,蔡宏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人移民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J]. 经济纵横,2019(4):86-94.

[12] DOUGLAS N.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flows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 the role of migration [J]. IZA journal of migration, 2015(13).

[13] 胡鞍钢,刘生龙,马振国. 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J]. 人口研究,2012,36(3):14-26.

[14] 陈继勇,陈大波. 贸易开放度、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 [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70(3):46-57.

[15] 陈建宝,嵇铸瑶,卢睿. 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基于MS-VECM的实证研究 [J]. 数理统计与管理,2017,36(1):18-28.

[16] 马进.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D]. 沈阳:辽宁大学,2018.

[17]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J]. 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18] 陈晓,郑玉璐,姚笛. 工业智能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J]. 华东经济管理,2020,34(10):56-64.

[19] 刘俊霞. 海外投资的腐败风险及应对——基于中亚五国投资条约仲裁案件的实证研究 [J]. 国际经贸探索,2018,34(12):81-94.

~~~~~

[基金项目] 侨联课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的跨国移民、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项目编号:17AZQK203),本文同时为武汉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成果。

[作者简介] 刁莉,武汉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